

# 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

张贤松

(乐山师范学院 体育系,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 讨论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体育观念方面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带动下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进程,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亡国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以主动的态度学习和传播近代体育,促成了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步确立。

**关键词:** 中国 近代体育 体育体制 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 G81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2)06-0018-03

## The effects of the west culture on China modern sports

ZHANG Xian-s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Leshan Normal College, Lesh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hanges of sports views in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riving by those changes, and suggested that it was learning and spreading modern sports actively that cause the beginning of China modern sports.

**Key words:** modern sports; sports system; the west culture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国门,泱泱大国竟然败于蛮夷小国,这不能不令朝野为之震动。魏源、林则徐等人率先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由此而生。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活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变。体育也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1 体育观念的变化

中国人体育观念的变化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的。当时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各国的军事及相关的工业技术,其中包括军事教育特别是军事体育训练,体育观念也由此而发生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訢等人倡导洋务,建工厂,开办京师学堂,组织军事留学,西方军队与学校的兵式体操因而渐渐传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中,西方的现代学校体育也有所开展。在这个时候,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是客观的事实,社会体育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从洋务派大力推行的西式军队训练来看,便可以知道军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已不完全同于以前。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办新军、开办西式军事学堂、出洋考察学习是“洋务诸事”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军事体育已渐渐传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淮诸军及后来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军中。

1860年前后任法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爱棠(Edan)指出:

英国海军上将贺布(Hope)一直没有放弃以西欧的战术训练一批清军的想法,以便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使清朝的正规军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华尔的洋枪队由1000人增加到2000人,部分的实现了这个想法,但是说到对清军起示范作用,事实证明,如果相信这一点,那是自己欺骗自己。<sup>①</sup>其实淮军将领左宗棠在看了华尔洋枪队的身体训练及战术训练后,曾经上奏建议仿效推行,只是清政府未能采纳。当时湘军、淮军除了由于采用洋枪因而不得不学习射击之外,其军队的编组及训练等,仍然一如其他绿营军队,只是军队的家族色彩更加浓厚。西方的军事观察家也指出:“太平天国时戈登(按:即洋枪队的首领,美国人)的活动,最少使李鸿章觉得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但是……由于官吏阶级的偏见与保守,这位中国最有势力的官吏在军事改革方面的成就是如何的微小。……至于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中国军队操练的主要项目是:重石头的掷接、快马射草人、列队操步、吹号角、喊口令。”<sup>②</sup>

观察家们注意到,士兵们即使在队列训练(按:队列训练是基本体操的内容之一)时,清军的官兵们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只是注意表面队形与服装的整齐,而不考虑步伐统一,军官们仍然是“从传统战术中培养出来的。”<sup>③</sup>尽管在旧军官们看来,西方的兵操与古代的练阵并无二致,然而作为现代体育组成部分的兵操毕竟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走阵。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西式身体训练在思想观念上的“容忍”似乎更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为现代体育在中国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脚之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当时湘军等采用西式

身体训练所得实效的影响。

相比之下,倒是当时出国考察的一些洋务官员们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体育的认识要系统、全面得多。1887年,奉旨出洋游历的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在12月21日参观日本高等女子学校后的日记中写道:“其学不外汉文……音乐、体操。按体操为学校通例,木器四:曰球铃,曰球棍,曰拿环,曰当拔耳(长尺余,日本无定名,此袭英语),而女独无当拔耳,适见体操铃、棍二法。”<sup>④</sup>这里的四器,即哑铃、体操棍、藤圈和火棒。我们虽然无法准确知道他对体育的看法,但长期以来不是教育内容的体育(体操)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一定给这位二品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在日记中对体操课的内容作了比其它课程更为详细的记录。

这些事从事例表明,随着洋务派新军、新学等的推行,部分国人对身体活动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这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虽然柔弱,但却是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终于激起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救国保种。严复曾到英国学习海军,对西方政治、教育也领会颇深,他在1895年1月发表的《原强》一文中,首倡力、智、德三育,称力、智、德三育为国家民族富强的基础,而民之手足体力尤为重要。他大声疾呼:“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五洲五六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sup>⑤</sup>此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说风行海内。当时有人评论戊戌变法之后的社会风气是:“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旧……二曰人慕欧风,多讲求于西学……三曰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帅,以研究体育之学。”<sup>⑥</sup>西学日进,中学日退,以至于“今日之中国使自知其病犹易,使自知其可爱则更难。”<sup>⑦</sup>

由此可见,现代体育观念已成为时代主流而开始左右中国体育的进程。

## 2 现代体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 2.1 近代学校体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虽然没有能够成功推行,但是新学却得以风行于世。世纪之交,在教会学校及新式军事学堂中,体操已成为必习内容。1897年,福州利济学堂何炯撰文称:“近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sup>⑧</sup>山东烟台的汇文书院1895年时,因为体育活动过多,每天课间里学生抢球、夺旗,十分活跃,但却因此被人视为“误人子弟”,以致部分学生退学以示抗议。<sup>⑨</sup>由此可见,在这些学校中,体育活动已非常盛行。进入20世纪以后,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以图苟延残喘。其中,废科举、兴学堂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广设学堂;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1906年通令各省设立体操学堂,从而打下了学校教育及体育制度的基础。现将有关学校体育的3个法令简介如下。

(1)《钦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等人拟定,共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多个章程,这些章程所确立的学制被称为“壬寅学制”。其中各级学堂必修课目中均包括体操。这个学制虽然正式公布,但却并未实施。但是它确立完整学校体系和体育制度框架的功绩不可磨灭。

(2)《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癸卯年)由张百熙、张之洞和容荣庆等人共同拟定,清政府正式颁行,也包括多个章程,各项规定较《钦定学堂章程》更为具体,它所确立的学校体系被称为“癸卯学制”。共分3段6级:其中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分科3~4年。通儒院5年。

《奏定学堂章程》对小学至高等学堂课程均规定设立“体操”课,具体要求如下:

蒙养院游戏:“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随意游戏者是使幼儿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主诸从之运动,且使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息。”

初小体操:“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校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正有礼之习,并当导以一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

高小体操:“提其义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乐群合众、动遵纪律之习,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以舒展其心思。”

中学体操:“中学堂体操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在进则更教中队体操、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sup>⑩</sup>

以上除蒙养院外,各级学校每周体操课均为3小时。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学校体育的完整体系均已在这一时期中建立。这个学制一直沿用至五四运动以后,方始正式废止。

(3)学部《通行各省推广师范一名额电》。《奏定学堂章程》施行之后,普通教育发展非常迅速。据当时官方统计,从光绪33年(1907)到国民元年(1912),学校总数增加了1.4倍,学生增加2倍,故教师包括体操教师重不足。为此,学部于1906年通电各省扩大师范生名额。电文如下:

各省将军、督、抚鉴:

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亟需养成,故师范尤要,应请迅将省城师范生名额尽力推广……必须设五个月属卒业之体操专修科,以养成体操教习……<sup>⑪</sup>

这个电报不仅解决了体育不足的燃眉之急,而且奠定了中国体育专业教育的基础,体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地位由此开始。

### 2.2 现代军事体育体制的逐步确立

早期的湘军、淮军等,虽然已经使用洋枪,但其军队的组织和训练仍然沿用旧法。甲午之后,清朝政府采纳了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开始按照西式方法编练新式陆军,先后称定武军、新建陆军、武卫军。1901年,清朝政府决定在全国推广常备军制,在原武卫右军(其余各军已在庚子事变中覆灭)基础

上编练北洋常备军。1903年,清朝政府设立总理练兵处,到1905年练成5镇(相当于后来的军),连同就旗常备军全部改称北洋六镇。1907年,清朝政府决定全面裁汰绿营,全面编练新军,到清朝灭亡时共建成14镇,18个混成协(相当于师)以及近卫军两协。

这些新建陆全部按西方军队方式组建,全部采用西方军队的训练内容和方法。其身体训练的内容除所谓兵式体操外,许多来自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也得以在新军中广泛开展。据北洋陆军第四镇镇志记载,光绪32年(1906)闰四月,北洋督练处曾派员到第四镇“考察单人教练、器械及活动体操,并抛球、踢球、拉绳、贯跤、举土袋等,按照军队内务书是否实行。”<sup>⑫</sup>1910年,驻成都的新军也请求“改建公园”;“设气枪射击场……其余打弹、踢球及体操用具。”<sup>⑬</sup>显然,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各种体育活动都是“军队内务书”中规定必须开展的。与学校相比,军队更具有强制性,因而体育的推行也更具有力度。现代体育因借助于军队的力量而得以确立。

### 2.3 现代竞赛制度的初步确立

随着现代体育在学校、军队的开展,各地都先后举行了以体操、田径为主的运动会。以四川为例,在1905和1908年,四川省举行了两次以学生和军人为主参加的省运动会,还有华阳、重庆、德阳、剑州(今剑阁)、夔州、长寿、云阳、合江、成都、富顺、綦江等县、市举行了运动会。当时县城人口不过万余人的綦江县举行运动会时,前往观看的人意竟然超过万人。许多县市举行运动会的时候,当地政府首脑亲自前往主持甚至发表演说。<sup>⑭</sup>类似的省、市还有湖南、北京、天津等。1907年在南京举行的“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又称“宁垣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参加的学校有80多所,比赛和表演的项目有69个。

最能体现运动竞赛体制确立的,是全国运动会的举行。1910年,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正式名称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当时报纸把这一次运动会称为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这次运动会分为3组进行:一是全国高等组分区比赛,一是全国中等学校组分区比赛,一是圣约翰书院等6校比赛。前两组比赛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5个区为参加单位。竞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4项。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共有140名,没有女运动员。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于1910年5月在北京举行。运动会的组织者是北京体育竞进会,实际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的美国干事。本届分全国为东西南北4部,每部为一个参加单位。运动员中田径选手96人,总数不详。竞赛项目比上届增加了队球(排球)和棒球两项。

从1913年开始,中国参加了由中、日、菲三国发起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意见改称远东运动会),表明中国体育已开始融入世界体育的主流。

可以看出,以田径、体操为特征的现代运动会已经成为当

时大受欢迎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同时也表明现在竞赛制度已经在中国扎根。

### 3 结论

从西方体育文化的侵入与中国体育方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期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

(1)19世纪后期,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带有一种抗拒和被迫接受的色彩,封建皇权还有强大的力量对西方文化包括体育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戊戌变法那样声势浩大,自强保种的呼声那样高,但在实际生活中现代体育的步伐却异常艰难。

(2)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社会开始以一种主动的态度宣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包括学习和传播现代体育,落后势力已经不能利用政权组织抵制西方文化包括体育的传播。因为政府也已经转而开始宣传并组织实施现代教育和体育。

注释:

①(法)梅邦·弗雷代,1860-1964年的太平军《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P193。

②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P433-434。

③同上书,P382-399。

④傅云龙,游历日本杂记·前编下,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P223。

⑤严复,侯官严氏丛刊(卷三),参见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参考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P356-360。

⑥欧榭甲,论改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

⑦国魂篇,浙江潮,1903年1期。

⑧原文无标题,利济学堂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雨水。

⑨王俊等,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P3。

⑩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88、421、436、511。

⑪学部总务司案牍科,学部奏咨辑要,宣统元年春(1909),参见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参考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P273。

⑫体育学院体育史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参考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P207。

⑬广益丛报,第230号,宣统三年(1910)四月十九。

⑭谭华,近代体育运动在四川的初期传播,四川体育史料,1983年3期,P1-4。